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走出“现代”的迷思

伍方斐 著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走出“现代”的迷思
——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通论

伍方斐 著
导师 林 岗
程文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现代”的迷思: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通论/伍方斐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5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978-7-5004-8618-3

I. ①走… II. ①伍… III. ①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研究-

中国 IV. ①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289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周 昊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83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Facing up to the problems in China: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 and theory in the globalization
2. Breaching through “language”: Postmodern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3. From deconstruction to constru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stmodernism literature and its problems

Conclusion Modernism of postmodernism? Or postmodernism of modernism? Or . . .

References

Epilogue

序

“后现代”思潮的西学东渐

林 岗

西方世界战后的学术和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统称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各种“后学”。“后学”在西方占据了人文学术的半壁江山，也是最为新锐的人文学术思潮。这个思想和学术格局的大变化，其实由来有自。远在 19 世纪，欧洲的思想界就已经发出不同于启蒙时代的声音，如叔本华、尼采、伯格森等，不再论述理性，关注理性，反而探讨意志、欲望和无意识；等到弗洛伊德出现，本能、潜意识、原欲更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启蒙时代对人性的发现，对理性的崇尚，已经让位于这个时代对本能和潜意识的发现，让位于这个时代对非理性的崇尚。这种与启蒙理性背道而驰的倾向，遂蔚为大观，它们催生了由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这股欧洲后启蒙时期人文学术思潮发展到完全成熟的 19 世纪末，刚好就是中国清末民初思想学术大开放、社会酝酿大变革的时代，它们几乎是和启蒙理性思潮一道进入中国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热衷于译介古典自由主义的严复，对法国大革命五体投地的梁启超，又可以发现一丝不苟读叔本华的王国维，以及不时将尼采挂在嘴边的鲁迅。他们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在西方历经两次世界大

战的惨痛教训，顺势从现代主义思想学术推进发展到以解构、颠覆为主旨的后现代思想学术之际，中国却因为现代革命的后果造成了超过一代人时间的对西方的封闭局面。所以当“后学”在欧洲风起云涌的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界却几乎无从与闻。80 年代左右，国门重开，后现代思潮从 90 年代初大规模传入中国，以此为标志，中国在文化学术上也进入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交织的全球语境。伍方斐的《走出“现代”的迷思——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通论》，正是研究西方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理论旅行”和引起回响的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笔者迄今为止读到的这方面最为全面和透彻的分析。

《走出“现代”的迷思》是伍方斐的博士学位论文，从题目定下来到现在的规模，他花了四五年时间。据我所知，光是初稿完成后的打磨、修饰、完善就用了近三年。其实他早就可以答辩并完成学业了。我相信他的延宕，并不是哈姆雷特式的犹豫，而是想让时间再沉淀，让问题更清楚地呈现。他对学术的认真和耐心，终于收到丰厚的回报。读过他书的人都称赞他的贡献。陈晓明称本书是“最为系统清理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史的学位论文，第一次清晰地揭示出这一思潮由解构向建构转型的总体趋势”；“从‘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把握‘后现代’思潮，看到中国当代的‘后现代’如何从‘现代’中挣脱而又与之发生复杂的关联，而‘现代’如何构成了中国‘后现代’的内在经验。”我认为他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我赞同伍方斐用“迷思”一词来指称晚清以来中国人对“现代”的一般经验。“迷思”一词，字面即有“执迷不悟之思”的意思，它实际上是英文 myths 音义兼含的译词，原意为神话。这个词无论字面和字背，都直通 20 世纪中国对“现代”的感知、理解和认同。因为在这个时代产生的中国人对“现代”的感知和理解，正是处于“执迷”以至于“不悟”的程度，把“现代”当

成一个可以包医百病的“神话”。如果说欧洲的现代是一个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工业革命和实验科技兴起等一系列漫长的社会变化结果的话，那中国的现代就是被列强欺负上门而从外部植入的，套用一個时髦的词汇是“被现代”的。当我们观察“现代”是如何被植入中国的时候，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它是浓缩的，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要消化西方数百年社会自然演变的精神和物质的成果。正因为它是浓缩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仓促了事的，仓促了事又导致了消化不良。第二，它是通过自身屈辱性的经验而意识到“现代”的价值及其必要性的。中国人对现代的感知从一开始就与挨打的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如果没有列强国家横加的屈辱，“现代”是一个可以拒之门外的东西，它不是社会内部充分自足的产物，只是被不愉快、被屈辱、被挨打的经验而唤起罢了。对中国人来说，不现代就意味着被列强欺负，不现代就意味着在洋人面前抬不起头，意味着割地赔款；反过来，现代就意味着民族独立，意味着富国强兵，意味着在洋人面前八面威风。也许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中国人这种对现代的一般经验，它与独特的成长背景有关，但这其中确实有很大的“迷思”的成分，这种对“现代”的展望如果不是病态的，那也是有非常严重缺陷的。

如果以欧洲启蒙运动作为参照，反观晚清和五四现代性的建立，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不同之点。众所周知，欧洲启蒙健将高举的大旗是理性，但理性仅仅指向蒙昧主义，却从来不指向信仰。他们反对教会用《圣经》解释一切，却从来不反对宗教和《圣经》本身。启蒙的敌人是蒙昧，不管这蒙昧是什么造成的，是教会也好，是迷信也好，是无知懒惰也好，启蒙精神一概加以反对。因为在启蒙的理解中，无知、迷信、蒙昧，都是人本身的问题。正如康德所说，“启蒙运动就是把人们从自己造成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因此，启蒙并不与信仰对峙，并不

与神对峙。启蒙精神并不追求与作为社会 and 传统中精神支柱的信仰和宗教彻底决裂，准确地说，启蒙所追求的只是另立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支撑，这个新的支撑就是理性。我们在谈论欧洲启蒙的时候，可能较少注意到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卷首用了法国著名雕塑家查尔斯-尼古拉斯·科钦（1715—1790）的一幅绘画。这幅画画龙点睛地图解了启蒙的世界观。“真理”站在中央的最高处，身穿薄纱，美貌依稀。她身旁的“理性”正用力扯去薄纱，以看清“真理”的芳容。而另一旁的“想象”正赶着去给“真理”献上花环，以美化她的娇姿。另一个美少女“信仰”却在背对“真理”，神情肃穆，抬头仰望，等待来自天上的光芒。各人做事依据各自天性而有所不同，而相互之间却是十分“和谐”。可是，当启蒙理性由新文化先驱引入中国之际，它却演变成追求与古代彻底决裂的猛烈异常的“现代性”。鲁迅的“吃人”意象，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吴虞的“打倒孔家店”等，无不昭示在新文化的理解中，古今、新旧乃截然对立之事，毫无融通的余地。理性意味着真理，真理意味着新文化本身，凡与之有异议者，皆在推倒之列。还有，欧洲启蒙主张理性，而理性则必然通向实验的精神、辩论的精神、对话与说服的精神，其结果是通向对异说的容忍，对异己者的宽容，所以主张理性的另一面是反对暴政，反对迫害，追求和赞美普遍的宽容。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需要坚持真理，但也需要对异说的容忍。然而，启蒙落实到中国的语境，却演变成寻求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旦真理在手，就以科学的名义、以人民民主的名义，将其他异说封杀。作为现代性核心价值的启蒙在中国通向了“唯一真理”，通向了对异说的不宽容，通向了思想的禁锢。

正是因为上述的缺陷，在西方后现代人文学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就已经对这个“现代”造成的后果不满意，客观上就需要一个突破，需要从中

走出来，从禁锢的死胡同走向自由的旷野。后现代人文学术来到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受到广泛的关注，实际上是适逢其会。如若没有这样一个国人深感沉痛的“现代”后果，后现代人文学术也不会那样一时洛阳纸贵。至于它与“再启蒙”思路的冲突，那是学术理路的矛盾，属于渊源所本不同。这种学术传承的相异在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并不排斥所追求的现实目标的暗中相合。伍方斐经过深思熟虑，以为西方后现代人文学术思潮在中国存在着与“现代性”的对话关系，它并非仅仅解构了“现代”，它同时参与到“现代”的建构中来，或者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后现代的解构，“现代”得以以更为合理的方式重建起来。这是一个高明的论点，也是很有价值的看法，我觉得是符合事实的。

本来按照西方的学理逻辑，后现代与启蒙理性根本上是对峙的。后现代人文学术思潮要解构和颠覆的正是启蒙理性，它们才不管启蒙理性有没有合理的成分，只是一个劲儿地颠覆，一味地解构，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就像那把“奥卡姆剃刀”，所向披靡，不问合理不合理，统统剃掉。启蒙理性遭遇后现代人文学术思潮，在西方世界所以如此冰炭不容，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有些东西笔者也不得其详。但是在学术传统上西方倒一直是“革命性”的，后说否定前说，在激烈的批判中前进。后现代人文学术对启蒙理性，批判尚嫌温和，一定要颠覆、拆解才够力度。这种前卫的姿态实在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这种激进的态度启发了谐谑、幽默甚至玩世不恭的精神。它像一股清风，吹进了中国的人文学术园地。现在事后想来，后现代人文学术所以风靡一时，乃至于时尚，很重要的便是它的这种“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的精神特质。而“再启蒙”的思路尽管在逻辑上和学术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终究昙花一现，失去五四当年的魅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沉重”敌不过后现代人文学术的“轻松”所具有的吸引力。“再启蒙”

和“后现代”之争，也许不是根本立场和追求目标之争。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笔者觉得它们确实有相通的地方，否则就根本无法对话，后现代也不会演变为具有伍方斐所指出的“建构性”。它们的基本区别是精神气质的区别，是姿态的区别。当现代性造成的后果需要以谐谑、幽默甚至玩世不恭的姿态对待的时候，当社会历史的变迁使得“沉重”不再具有魅力的时候，后现代的风暴便是难以拒绝的。

不管当年参与五四启蒙的思想文化界先驱有没有明确想到，启蒙思潮在中国客观上是描绘了一个具体的未来社会蓝图，这种澎湃的信心导致了它对“前现代”采取了断然的决绝姿态。这是“现代”所以“沉重”的地方，它对未来充满灿烂的憧憬，把建设“美丽的新世界”揽在了自己身上。可是历史的进程表明，理想的世界并没有到来，启蒙思潮“辜负”了人们对它的期待，甚至也“辜负”了它自己对自己的应有的展望。就像庄严肃穆相突然被打破，“美丽的新世界”美丽不再，而显露出当初“沉重”的可笑之处。承受“现代”后果的中国，这个时候，虽然“再启蒙”不失为一个清理现代后果的思路，但是因为前车之鉴，疑虑重重，担心再一次陷于“沉重”之中，而“后现代”刚好就在这个时候，以“轻松”的姿态走上批判的舞台。它是批判性的，但它对“现代”的批判与现代对于“前现代”的批判截然不同。它不显露庄严肃穆相，不再一本正经，而是以前所未有的轻松姿态，面对“现代”。它的批判武器很简单，就是拆解，或称之为解构，又叫颠覆，就是要让所有的“现代”自然显露出它自身所有的荒诞性、不合理性以及自相矛盾性。因为在习惯上人们皆认为“现代”大厦是用理性，庄严地建设起来的，而“后现代”则要人们打破这个成见，看到这座人们自己一手建设起来的大厦其实多有荒诞可笑之处，多有非理性或混乱荒唐之处。形象地说，就是撕开画皮，看见真相。很显然，“后现代”提供了一个反思

的视野，它不是对某事某物、一时一事的批判，而是对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结果的反思。“后现代”的反思是批判性的，它的视野是整体性的，对象就是人们念念不忘的“现代”。

人们对“后现代”的态度可能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正是由于“后现代”的反思和批判，使得“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彼此连成一线，再也不能截然分离。在其他方面，“后学”或许可以诟病，但正是这一点，我觉得是后现代人文学术思潮很重要的历史贡献。因为“现代”声称要同“前现代”彻底决裂，自己仿佛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起点，从此“时间开始了”，一个人间的天国将随着“现代”的展开而逐渐降临。这个宏大的叙事起点在“前现代”和“现代”之间划开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道想象性的断裂强有力地支撑着现代性价值，它几乎为所有貌似合理的价值对立提供了基础性的论证，例如蒙昧与理性、迷信与科学、专制与民主甚至贫穷与繁荣，前者在现代语境之下都让人想到“前现代”，而后者则无疑是归入“现代”的属性。但是，正是由于“后现代”的破土而出，这截然的界限被打破了，在“现代”的神圣面相模糊乃至消失的同时，“前现代”和“现代”便恢复彼此的连接和对话。蒙昧是需要去除的，但理性本身也不是绝对的；迷信是要不得的，但科学主义同样也是对科学的“迷信”。同样的道理，“后现代”一方面是解构了“现代”，祛魅了“现代”，但也未尝不是拯救了濒临衰败的“现代”，打捞了陷溺的“现代”。当我们用这样一种视野思考现代的时候，“现代”与“后现代”也就是彼此包含了，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处在持续的对话之中。

“后现代”刚刚登场献艺的时候，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解构技艺，化严肃为轻松的谐谑态度，曾经让人不理解甚至怀有不满。但是时间一长，它的良苦用心也就表现出来，至少“现代”是需要以“后现代”的反思视野与之对话的。这种对话就像“现

代”与“前现代”对话一样，并不是关乎谁拥有最后的真理，而是关乎人性的弱点。启蒙的道理在根本上并没有错，但人会“变本忘源”。知识构成理解现实世界的图景，但是随着知识的叠加，越叠越厚，它不但不会使现实世界的图景越来越清楚，反之却会使它模糊起来。换言之，知识有助于我们在现实世界争得自由，但随着知识增加，知识也会束缚我们，让我们失去自由。批判之所以不能缺少就在于批判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人性的弱点有充分的觉悟。现代科学带来的文明开化是有目共睹的，现代技术改善生活是随处可见的，但是现代科学造成的执迷不悟，现代技术造成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也是随处可见的。科学一方面加深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打开人天性中的“潘多拉盒子”，释放人性的贪婪。如果没有后现代的解构，没有后现代的颠覆，没有批判的视野，“现代”终究会像一场洪水，在荡涤“前现代”的蒙昧混浊之后，也将人类生活本身统统卷进这灭顶之灾里面。“后现代”与“现代”的持续对话，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它让我们认识到，“现代”不是一相情愿的许诺，它是人类社会自然演变的一部分，就像任何自然演变进程对人而言都有两面一样，“现代”也是一把双刃剑。

“现代”也许不是可以人为地抗拒的。这意味着“后现代”的解构会在某种程度上打住，意味着“后现代”的颠覆总有个限度。“现代”不是一副皮囊，一经解构便荡然无存，一经颠覆使人仰马翻。于是，“后现代”在诘难、批判、拆解“现代”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现代”，如果取消了“现代”，“后现代”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成为孤家寡人而陷于绝境。这种“后现代”和“现代”相互包含，相互对话的复杂关系存在于当下生活的每一刻。伍方斐在《走出“现代”的迷思》里把这种当下生活里的复杂关系表述为建构性的“后现代”，这是他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学术界对“后学”价值的重要认知。在欧洲，“后现代”对

“现代”气势汹汹，没有商量斟酌的余地。但是它经历漫长的旅行来到中国，却被发现多少融入了此地的风土人情，它与“现代”对话的一面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它的解构本性依然故我，但却在解构中滋长了建构性。伍方斐建构性的“后现代”概念的确能够概括“后现代”人文学术思潮西学东渐而形成的特性。这又是一个例子，外来的思潮在移植的过程中必定发生适应本土文化特征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它生命力存续的前提。以中国而论，其“现代”是属于后发性的“现代”，与原发性西方的“现代”相比，少了成长过程的从容不迫，多了列强环伺的险恶环境。当民族一觉从“前现代”的迷梦中醒来之际，已经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了。“现代”不仅是一个社会的自然演变过程，而且也是民族生存的不贰法宝。无论是感情还是理智，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现代”的亲 and 性是不言而喻的。“后学”的传入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中国与“现代”的这种亲和性，它也只能加入到此种历史条件中来。其中逐渐演变得具有建构性，便是体现了理论话语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从而也是此种亲和性的表现形式。

伍方斐的著作详细地演绎了西方当代理论话语在中国的传入、移植和演变，系统清理和“讲述”了后现代思潮本土化在译介传播、创作与批评、理论建构等阶段和层面的“故事”，并发现和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这是多条线索的复杂故事的叙述，有着很高的难度，然而伍方斐却能够把它讲述得清清楚楚、有声有色。理论著作尤其是“后学”一类容易失之晦涩难懂，而伍方斐历经多年钻研，一如庖丁操刀，脉络分明；他以晓畅明白的语言娓娓道来，做到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正值本书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出版之际，附上数言，聊表读后感想并以为序。



作者简介

伍方斐 1964年生，湖南常德人。1982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2002年起在职攻读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后现代文化等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台港澳及海外客籍作家研究》等著述；在《文艺研究》、《学术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学术成果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广东省文学评论奖。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走出‘现代’的迷思”为题，以“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为主线，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作历史的、逻辑的与美学的分析。全书从清理“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史叙事入手，考察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从译介话语向创作与批评话语、再向理论话语推进的本土化进程和多样化形态；并勾勒出这一思潮“从‘现代’中诞生”、“解构‘现代’”、“重构‘现代’”的发生和流变轨迹，以及从“解构”向“建构”转型的总体趋势。本书认为，“后现代”是对“现代”的根本性问题和后果的全盘反思与超越，但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对话与互动中相互渗透和改造。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后现代”主要表现为对“现代”的重写与重建，因而仍是中国现代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独特价值在于为现代化和现代化叙事提供全面的反思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 主 任：汝 信 江 蓝 生 陈佳贵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辑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 蓝 生

汝 信 刘庆桂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 编 辑：赵剑英

学术秘书：冯广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重点研究项目资助
广州市“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
广东省“211 工程”三期人文学中心建设重点项目资助